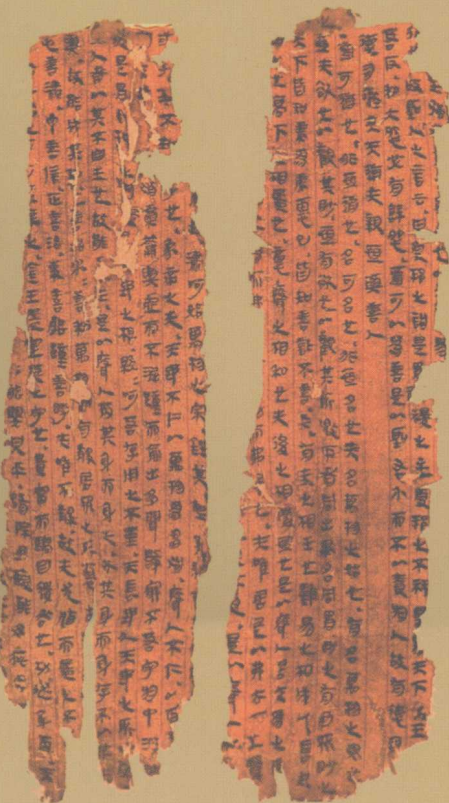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 编

追寻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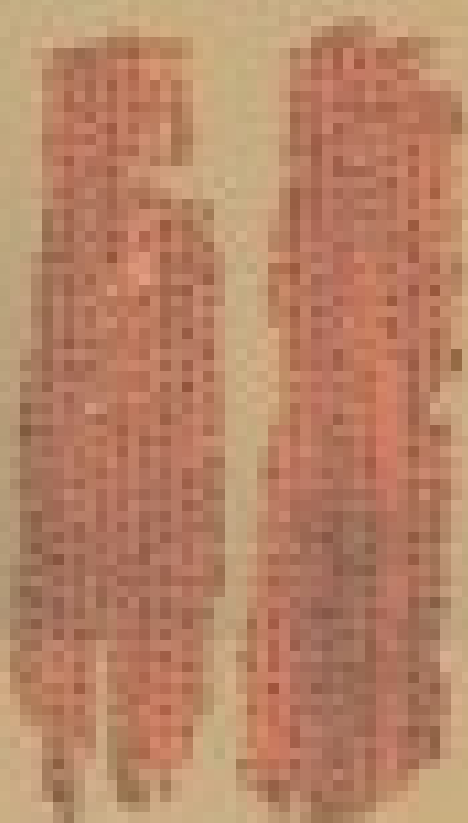
中国哲学研究集粹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海防平話

海防平話



追寻智慧

—— 中国哲学研究集粹

(2002—2006)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智慧：中国哲学研究集粹：2002—2006/上海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6

ISBN 978 - 7 - 80745 - 053 - 5

I. 追... II. 上... III. 哲学—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5727 号

追寻智慧——中国哲学研究集粹(2002—2006)

编 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

责任编辑：沈 洁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宝山杨中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5.75

插 页：2

字 数：44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053 - 5/B · 007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杨国荣

哲学本以智慧为其题中之义：自它诞生之时起，其思其辨便伴随着对智慧之境的绵绵追求。然而，近代以来，相应于“技”渐显而“道”渐隐的历史现象，智慧似乎呈现某种被遗忘的趋向。如何克服智慧的遗忘、回归智慧之源？这无疑在今天从事哲学思考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以此为背景，我们不难看到《追寻智慧》一书的内在意义：追寻智慧的理论意蕴，在于通过历史的回溯而走向智慧。

本书的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中青年学人，全书汇集了该所近年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多方面研究成果。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文献材料的考释、梳理，后者是一种非常基础性的工作，没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哲学史的研究将成为空中楼阁。《追寻智慧》的作者对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些重要的理论辨析（如关于名家的分流别派问题），都以细致的文献疏证为依据，由此而引出的结论，也展现了内在的学术意义。

哲学史的研究同时无法与哲学理论的思考相分离。以往的各种学说、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存在。然而，按其本来意义，它们首先是历史上的哲学创作，是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原创之论。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所立之说，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就是说，它们首先是哲学，而后才是哲学史。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那些流传下来的文本，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的这些创新理论的载体。正是由于哲学史上的这些学说、体系本身是当时的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创新见解，因而对这些体系的研究，要求我们对哲学理论本身有一比较深入的理解。换言之，哲学史的梳理，离不开对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这两者之间不应该截然地划界或分家。



哲学与哲学史的联系,当然不仅仅在于历史上的哲学在当时也是一种创新性的体系,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它还涉及历史的回溯与理论建构的关系。哲学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就史论史或为历史而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不应该仅仅满足某些历史的兴趣;在更深的层面,它同时也与我们今天的哲学沉思相联系。从哲学史上看,每一个时代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总是在回顾、总结以往哲学家的思维成果之后,进而提出他们自己的系统;同样,今天的哲学史研究,也面临着如何进行理论建构、发展当代哲学的问题,而哲学史的研究,则无疑为这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资源。

从以上前提出发,对中国哲学(包括儒学)的理解似乎也可以有一个广义的维度。在学科的视域中,中国哲学通常主要被视为研究的对象,这一理解的前提,是将中国哲学规定为历史中已经存在的形态(既成的形态):从逻辑上说,惟其既成或已然,始能成为研究与考察的对象。然而,如前所述,以往的哲学系统在成为考察与诠释对象之前,首先呈现为理论沉思或理论建构的产物,这种理论沉思或理论建构通常展开为一个过程,后者使中国哲学同时具有生成的性质。事实上,历史中的各种哲学体系总是形成于一定历史阶段,尔后才逐渐取得已然的形态,并凝结为哲学的历史。可以看到,既成的形态与生成的过程,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相关规定,两者具有互动的性质:在不同时代,通过创造性的思考而形成的哲学系统,不断地丰富、深化着中国哲学的内涵;作为已然或既成形态的中国哲学,则构成了新的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前提。如果说,既成性赋予中国哲学以某种相对确定的形态,那么,生成性则使中国哲学呈现开放的性质。

作为既成形态与生成过程的统一,中国哲学同时也获得了哲学与哲学史的双重品格:就其既成性(作为已然的体系和对象)而言,中国哲学较多地表现为哲学的历史,就其生成性(哲学沉思的延续)而言,中国哲学则更多地展现为历史中的哲学。在此意义上,显然不能仅从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哲学:质言之,中国哲学不仅表现为一种“史”的形态,它同时也是一种理论的形态。这里涉及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的关系,而中国哲学史则不能离开广义的中国哲学来理解。

中国哲学的以上内涵,从本源的层面规定着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以历史中的既成系统为存在形态,中国哲学的澄明、阐释离不开历史的观念。这里所说的历史观念,包括重视既往文献、关注哲学家或哲学体系出现的社会背景等等。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过程中不断生成的观念系统,中国哲学的研究又需要一种理论的视野。所谓理论的视野,首先是指我一再提到的史与思的统一。如前文一再论及的,历史中那些流传下来的文本,同时或首先也是一定时代哲学系统的载体,对它们的考察,总是与一定的理论背景相联系。事实上,对同一个学说、同一个文本,不同的哲学家常常会有不同的理解,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不同的解释者自身理论背景及相应的视域常各不相同:解释理论背景的不同,往往便导致了对同一文本理解上的差异。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事实上也是从他们所达到、所理解的理论出发,对以往的文本作出他们的解释。从这一意义上看,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同时也是对哲学的研究,哲学史的研究并非与哲学的研究完全分离。与之相联系,对哲学史上问题、人物、思潮等等的研究过程,总是涉及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历史的积累或历史的准备;另一个就是理论的准备。没有历史的准备和积累,哲学史的研究便会流于空疏,同样,如果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也难以对哲学史上的系统做出深入的、新的理解。

以前面提到的生成过程为内在的向度,中国哲学本质上具有开放的性质,这里的开放,包括以每一时代的思维成果丰富、拓展自身。与之相联系,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理论视野,同时也意味着通过创造性的研究,使中国哲学在新的历史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不断展示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冯友兰曾区分了所谓“照着讲”与“接着讲”,历史地看,这两者事实上总是相互交错、彼此互动。

一方面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哲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哲学史的研究,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理论的循环。不过,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循环,它所体现的,实际上是哲学和哲学史之间的一



种建设性的相互作用过程。

从以上前提反观《追寻智慧》一书,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注意到其学术意义。在注重历史考释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忽视理论分析。从先秦哲学的回溯,到近代哲学的反思;从诸子的辨析到佛家的考论,文献爬梳每每交织着哲学内涵的评析,这种研究的进路,从一个方面具体彰显了“追寻智慧”这一全书的主题。

当然,作为学术的探索,本书对有关问题的考察,并不意味着终结相关领域的研究。若干论点或可继续讨论,一些评论性的看法略显疏而泛,有待进一步具体论证。不过,“追寻智慧”本身展开为一个过程,并具有理论的开放性,从探索与“追寻”的视域看,本书无疑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目 录 *mulu*

序	杨国荣	1
---------	-----	---

先秦哲学

《周易》诠释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周 山	3
老子的“为道”及其体验	周 山	19
郭店竹书《老子》论析	李若晖	33
从《学而》篇看《论语》之编纂	李若晖	88
定州《论语》分章考	李若晖	97
复礼、为仁、君子——孔子思想的三个支撑点	周 山	105
尚贤、节用、兼爱——墨子平民政治的三个支撑点	周 山	126
由《汉书·艺文志》推测古本《文子》之面貌	李若晖	147
孟子的“四善”论	周 山	158
孟子“仁心”的本体论阐释	余治平	177
逍遥、齐物、和谐——庄子的三个话题	周 山	191
解读《指物论》	周 山	208
“同异”、“坚白”之争的重新解读	周 山	221
经权、常变的智慧——中庸之道的哲学根据	余治平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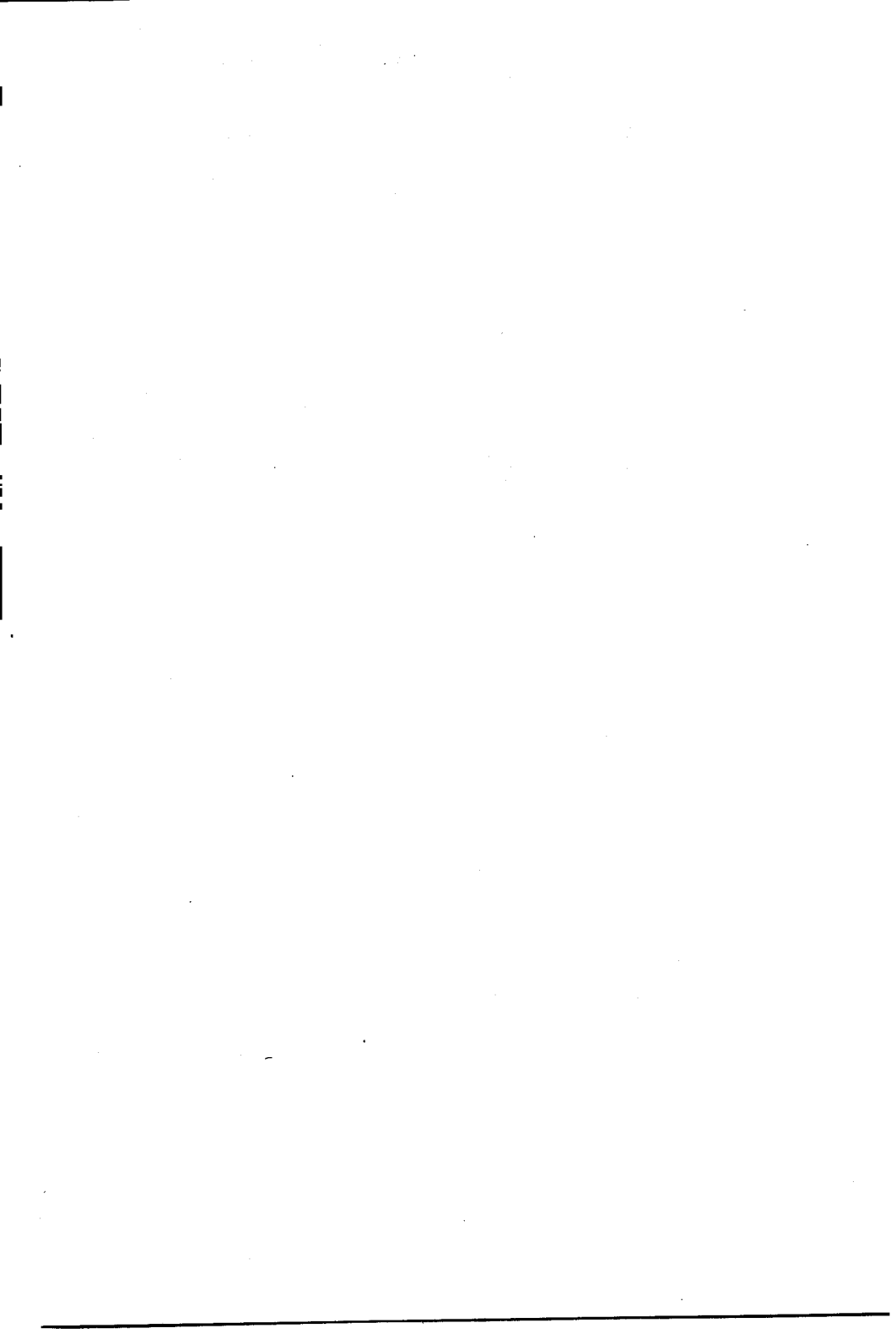
中国佛学

南北朝佛教“南慧北定”特色的成因剖析	夏金华	251
唐代法相宗衰落原因新论	夏金华	263
关于“一性皆成”说的真义之探讨	夏金华	278
论“唯识无境”的真实含义	夏金华	303
佛学中没有“本体论”	夏金华	314
佛学中的生死观	何锡蓉	334
佛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互补互融	何锡蓉	353
从“入静”到“主敬”——佛为儒用的一个范例	何锡蓉	368
禅宗与华严的综合倡导者——从应慈老法师到真禅法师	夏金华	388

现当代中国哲学

中国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之兴起	方松华	401
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潮反思	方松华	414
对金岳霖《论道》之中国哲学属性的疑窦	方松华	431
冯友兰与中国现代哲学形而上学的建构	方松华	446
中国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冲突与融合	方松华	455
重构中国哲学：前景、可能与资源清理	余治平	466
追寻儒学的当下生存	余治平	482
编后记		494

先秦哲学



《周易》诠释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周 山

《周易》作为中国诸经之首，二千多年来诠释文字之多，难以计数。然而，尽管诠释之书汗牛充栋，今人对《周易》的诠释仍然见仁见智，人言人殊。笔者认为，《周易》诠释的分歧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评判《周易》的本质；二是如何正确处理象数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三是如何准确把握《易传》在诠释中的参考作用；四是能否用西方文化作为价值标准诠释《周易》。

一

诠释离不开语境。任何一个诠释对象，都有其确定的语境；当且仅当这一语境之中，诠释才能准确有效地展开。人言人殊，往往是将同一对象置于不同的语境中加以诠释造成的结果。

《周易》这一诠释对象，究竟应该置于何种语境之中，才能保证诠释的准确有效性？

在阐述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对《周易》这一诠释对象作一个明确界定。今人使用“《周易》”这一概念，往往与《易经》、《易传》混淆。其中之一，认为《周易》即《易经》；其中之二，《周易》包括《易经》、《易传》两部分。所谓的“狭义”与“广义”之分。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问题的。首先，《易经》是“上古三易”的总称，包括夏代的《连



山》、商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以前曾一度怀疑《连山》、《归藏》二易为子虚乌有,因而有《易经》即《周易》的说法。现在,我们从荆州王家台秦墓中发掘到的竹简中获悉确实存在《归藏》一书,而且其中大多卦名与《周易》一致,由此表明先人关于古代“三易”之说并非虚妄之辞;《周易》与《易经》便不能再视为二名一实。《连山》、《归藏》、《周易》分别为夏、商、周三代的《易经》,诠释《归藏》佚文,应将其置于商代背景之下;诠释《周易》,应将其置于周代背景之下。作为春秋末、战国初、中期文化背景下的《易传》,虽为《周易》的首次诠释,毕竟与《周易》不同,不应将其视为《周易》的组成部分;李镜池先生说:“《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内容性质有很大的差别。”^①这种所谓《周易》广义之说,实属不妥。

综上所述,《周易》即周代的《易经》,与《易经》、《易传》有联系也有区别。本文所说的关于《周易》的诠释,便是关于周代《易经》的诠释。

《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是决定将之置于何种语境之中加以诠释的关键所在。综观《周易》诞生以来的三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思想家,尤其哲学家们,似乎都对《周易》有所研究,都从《周易》中汲取营养滋润自己。即便像明代的心学家,包括二流、三流的心学家,也都乐此不倦。但是,到了近代尤其现代,《周易》的学术地位急剧下降,不仅多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全无《周易》的地位,而且所有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和《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也仅仅将《周易》作为《易传》的附属品稍事提及,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加以批判。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书。

根据最近三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新成果推断,《周易》中的符号系统即其六十四个卦象的前身,是数字卦;数字卦则直接产生于占

^① 《关于〈周易〉的性质和它的哲学思想》,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7月14、21日,后收入作者所著《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

筮。《连山》、《归藏》的具体运作情况,我们无法揣知,《周易》诞生之后的早期,确实与占筮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左传》、《国语》中记载有二十几个筮例,其中公元前七世纪的筮例,绝大多数是通过占筮获得相应的卦象、卦爻辞,进行决疑解难的推论。

由于有了这些历史的记载,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之书的观点,便有了充足的理由。由此确定,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吉、凶断语是“贞占”之辞,也便顺理成章。

但是,一些易学专家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周易》卦爻辞的构成并非如此,其作用也不是为了满足占筮活动的需要。我国现代著名易学家李镜池先生的研究历程,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研究认为,“我们相信《周易》是卜筮之书:其起源是在于卜筮;其施用亦在于卜筮。”“我对于《周易》卦、爻辞的成因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就是,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周礼·春官》说:‘占人……凡卜筮,既事则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所占一定有一爻数占的,因而有数种记录。到了岁终,就把所占的各种记录汇集比对,而计其占之中否。所以卦、爻辞中,很有些不相连属的词句,这不相连属的词句,我们非要把它分别解释;若硬要把它附会成一种相连贯的意义,那就非大加穿凿不可。”^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三十年之后的李镜池先生对《周易》卦、爻辞的诠释已经有了重大变更。他在完成于1962年5月12日的《〈周易〉的编纂和编者的思想》^②一文中这样写道:“《周易》的卦有不少是内容有组织联系的,并不是毫无系统的资料杂抄,每卦有它的重点,讲一个问题。”“由于每卦有一个中心问题,有内在联系,所以我们研究它,首先要找出它的中心问题,内容思想,不能孤立地本着一一条一条卦、爻辞,或摘引个别辞句,随便解释或阐发其意义。”甚至还说:“《诗经》是抒情的,而

① 《〈周易〉筮辞考》,原载《古史辨》第三册上(1931年11月),后收入作者所著《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

② 此文原载《周易探源》一书,中华书局,1978年。



《周易》是思辨的,思辨的著作,尤其值得我们去分析其中的哲学思想。”

对于卦、爻辞价值评判的这一重大转变,李镜池先生在同一年写作《周易卦名考释》一文时,特意写了一段补记文字:“最近写《周易通义》一书,才明白卦名和卦、爻辞全有关系。其中多数,每卦有一个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标题。”五年之后的1967年4月15日,李镜池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再次表示:“据我的研究,《周易》是有组织体系的著作。古今说《易》者还没有注意到此点,但此点不明,对卦爻辞就很难理解,理解了也不一定对。”^①

李镜池先生是少数几位毕生致力于《周易》阐释的前辈学者。他的上述思想转变,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准确阐释《周易》本义,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周易》性质的重新确认,直接影响到在诠释《周易》时将其置于何种语境之中;对于《周易》卦、爻辞尤其是吉、凶断语的诠释,也就两种模样。如果把《周易》置于占筮书这一语境之中加以诠释,吉、凶断语就是一种“贞占”之辞;如果把《周易》置于以类比为其特点的思维工具书这一语境之中加以诠释,吉、凶断语就是一种关于某类事物情况的价值判断。

例如,《比》卦的卦辞:“比,吉,原筮,无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相亲相助必然吉祥,即便占筮问讯,也必大吉大利,不会有错。但是,如果这种相亲相助不是出自真心,而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在相亲相助,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才违心地附和上去,其结果就会凶险。这一卦的初六、六二爻辞对“有孚比之”、“比之自内”亦即真诚的、发自内心的相亲相助作出了“无咎”和“吉”的评判和肯定。《临》卦中的初九、上六爻辞,通过“吉”、“无咎”的断语,对以真诚、敦厚之心治民的行为作出了肯定,而六三爻辞“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也”,则对虚情假意哄骗百姓的行为作出了否定。在《周

^① 《论〈周易〉的著作年代——答郭沫若同志》,原载《华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四期。

易》六十四卦中,唯《谦》卦的卦、爻辞,都是“吉”、“无不利”的断语,体现了《周易》作者对于谦逊美德的推崇。

总之,通过卦爻辞与判断语之间关系的考察分析,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周易》作者的价值取向。整部《周易》的卦爻辞及其吉凶断语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周易》几千年来帮助人们思考问题、指导行动方向的重要功能。设若将《周易》视为占筮之书,将其置于占筮语境之中加以诠释,不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玄之又玄失却方向。

《周易》诠释中的语境问题,还有更深层面上的把握。如果说,将《周易》置于以类比为特点的思维工具书这一语境之中,将吉、凶断语视为一种价值判断加以考察,还不能保证《周易》诠释的准确有效性。这是因为,这样的语境定位还只是一种整体性定位。《周易》诠释还应包括下一个层面亦即每个重卦的语境定位。《周易》六十四卦分别拟象六十四种事类,因此,每一个卦象及其卦、爻辞,都处于一个特殊的语境之中。不仅所处位置相同的爻象所含之义不同,而且相同的卦、爻辞,因为语境不同,释义也就两样。例如,同为初六爻,由于所在卦的其他六个爻的阴阳情况及其阴阳爻所处位置的不一致,对初六爻象含义的诠释也就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的意义,也通过该爻象相应的爻辞尤其吉凶断语予以展示。例如,《升》卦的初六爻,与《井》卦的初六爻,相邻的第二、第三爻都是阳爻,所对应的第四爻都是阴爻,仅第五爻阴阳不同:《升》的第五爻为阴爻,《井》的第五爻为阳爻。然而仅此一爻之别,形成两个不同的语境:《升》为地下之木,形成木从地下生长、茁壮成长的“升进”语境;初六虽弱小,且处于最底层,然而如同幼小之苗,破土而出是其本性,也是必然的趋势。《升》的初六爻辞:“允升,大吉”,也正揭示了这一爻象的本义。《井》为水下之木,形成木桶入水、井水上升的语境:初六爻以阴居于井底,如同井底之泥,积之既久,人禽共弃。所以,《井》的初六爻辞说:“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总之,我们不仅要对《周易》这部书作出准确的语境定位,还要根